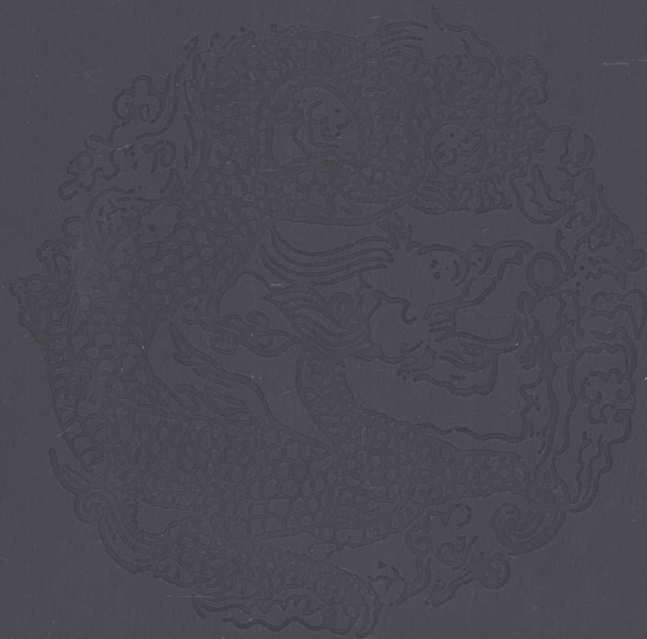


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

1949~2009

上

宋大川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

上

宋大川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 / 宋大川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3-025569-3

I. 北… II. 宋… III. 考古发现—北京市—1949~2009 IV. K8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1189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雷 英 / 责任校对: 包志虹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装帧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1 3/4
印数: 1~1500 字数: 878 000

定价: 600.00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主 编：宋大川

副主编：夏连保 张治强

撰稿人：郭京宁(史前) 张智勇(商周) 胡传耸(春秋战国)

张治强(两汉) 董坤玉(魏晋隋唐) 于 璞(辽代)

丁利娜(金代) 孙 勳(元代) 李永强(明代)

朱志刚(清代) 张中华(清代)



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早，早在1927年中国考古学的萌芽阶段，就开始了对北京房山周口店的猿人遗址的试掘，并于1929年出土了引起世界轰动的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但是，北京地区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大量展开和北京地区考古文化序列的建立，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考古学者完成的。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飞速发展，北京作为首都，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田野考古工作全面铺开。在新的形势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不仅注重田野考古发掘，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和对文物的保护工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组织科研人员认真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把田野考古、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北京的考古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新中国的建立到新世纪的发展，60年来，老一辈考古学家和新一代考古工作者为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历史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史前时期与夏商周考古

1. 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

学术界一般将史前人类使用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史前时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1918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对北京周口店古猿人遗址的试掘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外科学家对北京地区远古时代历史发展脉络的追寻，一直没有停止过。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田野考古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对周口店遗址开展了多学科研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主要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新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遗存。迄今发现的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各阶段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约有48处，涉及北京9个区县，大多数集中于山区、半山区，平原地区只发现有3处。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大约属于地质时代的中更新世，绝对年代为距今60万~20万年前，当时的北京人已进入直立人阶段。中期在地质时代属于晚更新世初期，距今20万~10万年，当时的北京人已进入早期智人阶段，旧石器晚期属于地质时代的晚更新世晚期，距今10万~2万年，此时的北京人已进入晚期智人阶段。北京地区旧石器晚期已发现的遗存分布比较广泛，不仅在北京的郊区有所发现，而且在城市的中心区也有分布。目前，已发现的有房山周口店山顶洞、田园洞，密云东智，延庆佛峪口，怀柔杨树下、东帽湾，平谷罗汉石、马家屯、上堡子、刘家沟、海子、洙水、小岭、

豹峪、甘营、夏各庄和安固，昌平雪山遗址、门头沟西胡林和齐家庄，朝阳双桥，王府井东方广场，西城西单中银大厦等22处。

北京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不晚于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地质年代属全新世，这一时期的人们逐渐使用研磨的方法制造石器，开始制作陶器，定居生活，产生原始农业并饲养家畜。在此基础上，人们从山洞中迁徙出来，选择平原地区定居。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全部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获得的，目前已发现的遗址、墓葬和零散遗存点约有40余处，较早时期的有门头沟东胡林遗址、怀柔转年遗址等，年代在距今10000~9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发现较为重要的典型遗址有平谷上宅遗址、北埝头遗址、密云县燕落寨遗址及镇江营遗址等，其年代在距今9000~7000年前。

2. 夏商周考古发现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北京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即历史上的夏至西周这一历史阶段，历史学家通常也将这一时代称之为“三代”。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周王室同姓贵族召公于北燕，即今天的北京及周围地区。北京地区的夏商周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此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迄今已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重要遗址和墓葬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张营遗址、镇江营与塔照遗址、龙坡遗址、琉璃河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刘家河商墓、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白浮村西周木椁墓、金牛村墓葬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零散发现。随着田野发掘所获得的考古信息的不断增多和考古学文化的确立，目前学术界已对这一时期的年代谱系认识日趋完善，研究表明，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包括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文化以及西周燕文化等几个部分。

3. 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

北京地区在春秋时期属于燕国的境域。燕国自西周初年就封在今北京地区，根据史记的记载，西周初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於北燕”。也就是说，到平王东迁的时候，燕国已经在这里存在了300余年，其都城所在地过去一直未能确定其位置。自1958年琉璃河遗址被发现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的燕国都城位置就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

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当时的北京地区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一个是位于北京南部的燕文化，另一个则是位于北部燕山山地间的“玉皇庙文化”。这意味着当时在北京地区很可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春秋时期燕国的境域或许并不能够覆盖今天的整个北京地区，春秋时期燕文化的遗存，大部分分布在今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境内，如镇江营与塔照遗址、丁家洼遗址、前后朱各庄遗址等，只有一处发现于顺义区境内，而该处遗存的年代已经到了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玉皇庙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北京市延庆县北部的军都山等燕山余脉的山前地带，主要遗址有玉皇庙墓地、葫芦沟墓地、西梁堽墓地等。春秋时期是玉皇庙文化的繁盛时期，这种繁盛的局面可能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之际。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玉皇庙文化向北、向东——主要是向今河北省怀来、滦平等地的迁移，燕国的境域基本完全覆盖了今天的北京地区，甚至还向东北等地有了较大的扩展，考古

发掘资料表明，当年的燕国长城已经延伸到了今天的辽宁、河北、内蒙古等境内，证实了文献记载的战国时期燕国向北开疆拓土的事实。而文献记载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燕北五郡的大致范围内，也发现了较多战国时期燕文化的遗存，基于这些发现，可以说战国时期的今北京地区，基本是燕国一统的局面。

二、汉唐时期重要考古发现

就北京地区而言，汉唐时期在考古学上一般是指秦朝建立之后至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之地献给契丹1000余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北京地处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过渡区，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这一时期在考古学上呈现出鲜明的军事色彩与民族融合特点。北京地区的汉唐考古始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时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城址和墓葬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收获。

1. 汉唐时期的城址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在汉唐城址的考古发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两汉10个县城、西晋蓟城、唐幽州城城址的具体位置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已经基本得到确定。作为北方重镇与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发现的城址所体现的军事防御功能与民族贸易中心的特征尤为强烈。

西汉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度，郡和王国以下设县，北京地区时属涿郡、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等5郡14县的管辖之下。自20世纪50年代始，至今已发现两汉时期的县城城址10余处，这些城址分布较为密集，其中，较为重要的大致有6处，即朱房村古城、蓟城、良乡、广阳、西乡、阴乡等县城城址，这些城址多为战国或西汉时期修筑，东汉时期继续沿用。1954~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清河镇西约1公里的朱房村，发现了一座古城，并先后5次对该城址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发掘，城墙遗址大小基本符合秦汉时期的县城规制，推测可能是秦汉时期防御胡人的重要军事基地和贸易集散地。1956年，在北京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最为密集的战国至西汉陶井群，据其地理位置，基本可以推断两汉时期的蓟城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1959年，在今房山区窦店镇西侧发现一座古城遗址，经考证为汉良乡故城。1962年，在位于房山区良乡镇东4.5公里的广阳城村调查时，发现村东南有一段长约40米、高约4米的残土城墙，经考证确系为汉广阳城旧址。1962年，在房山区长沟镇东测，发现一保存较好的城址，从城址规制和城中采集物判断，调查者认为该城址为汉西乡县故城。2001年7~9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大兴区文物管理所对大兴县芦村古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调查者依据现场调查和历史文献记载，认为该城址为汉阴乡县城遗址。

唐幽州，治蓟城，又称幽州城。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史思明先后称帝，相继以范阳(幽州)为都，安史之乱平定后，改范阳郡为幽州，以蓟城为州治。根据60年来考古发现的部分唐代墓志，结合房山石经题记，现已基本可以复原唐代幽州城的城址四至：东墙约在今法源寺东墙的南北延长线上，西墙大致在今会成门村稍东一带，南墙大致在今白纸坊东西街

一带，北墙约在今头发胡同一线。幽州城内部分巷坊的名称虽已经明确，但具体位置目前尚难以确定。此外，已发现的唐代墓志与房山石经题记对于幽州城郊的蓟、幽都、潞、昌平、良乡等5个县属乡村（里）均有记载，其中蓟县的7乡15村、幽都县的9乡11村（里）、昌平县的4乡4村（里）、潞县1乡2村（里）、良乡县的5乡18村（里）均有记载，这些乡村（里）的一部分具体位置已大致考证清楚。

2. 汉唐时期的重要墓葬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田野考古发现的汉唐时期墓葬计有80余处，广泛分布在今北京城区与各郊县，而两汉与唐代墓葬占了绝大数量。其中可以确定为两汉墓葬的点共发现40多处，墓葬约1540多座，既有等级较高的燕国诸侯王及王后墓，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平民墓葬群。考古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墓葬较少，共清理13处19座，主要分布在海淀、顺义、石景山、延庆、房山等5个区县，由于发现数量较少，这个时期的墓葬还难以从考古学上进行系统的分期。唐代的墓葬30余处，这些墓葬中最为典型的是少数民族首领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幽州地区的民族与羁縻府州制度提供了实证材料。

在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两汉墓葬中，位于今丰台区郭公庄的大葆台汉墓和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教练车场东南环路北侧的石景山老山汉墓，是迄今为止在北京地区发现的两座两汉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为研究两汉时期贵族的丧葬礼制与墓葬形制演变提供了重要信息。

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较少，共有13处，其中魏晋时期9处，北魏、北齐各2处。魏晋9处墓葬分布在海淀区清河镇、海淀区八一小学、海淀区景王坟、海淀区八宝山、顺义县马坡公社大营村、石景山老山南坡、石景山八角村、房山区小十三里村和延庆县东王化营村等地。北魏的2处墓葬，为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北魏纪年墓和大兴黄村镇小营村北魏墓。北齐的两座墓葬，其一在怀柔县韦里村，据出土的墓志，墓主为傅隆显，其二在西城区王府仓。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典型的墓葬当数西晋华芳墓，该墓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以西约500米，发现时间为1965年，对研究西晋时期的历史与官制均有重要价值。

北京地区已发掘的唐代墓葬数量较多，最有历史价值的是史思明墓、归义王李诗与其妻的合葬墓。史思明是唐代“安史之乱”的主要发动者之一，1966年在丰台区林家坟村西发现了史思明的墓葬，1981年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该墓为单室，仿帝陵形制，用汉白玉石条砌成，墓室前设有20余米斜坡式墓道，墓道内填满石料，并发现有石像生的残断手臂，墓室两侧各设有一耳室，东侧耳室已毁，唯西侧残存一耳室，耳室内有壁画残迹。该墓随葬品除60年代搜集到的铜牛、嵌金铁马镫外，总共还出土了40余枚玉册，分为哀册和谥册。199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房山县医院，对唐归义王李诗及妻合葬墓进行了发掘。该墓早年被盗，男主人墓志仅存志盖，上书“李府君墓志”；女主人张氏墓志则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张氏墓志中间篆书，有“唐故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故贝国太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等字样。据两《唐书》记载，唐代共设了四个归义王，分别为西突厥处罗可汗、东突厥颉利可汗、史思明以及奚族酋长李诗。唐代曾在幽州设立了众多的羁

縻府州用于安置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归义州便是其中一个用于安置奚族的羁縻州。史思明墓与李府君夫妇墓葬的发现，再现了唐代北京地区的民族生活，为研究唐代的藩镇与羁縻府州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

三、辽、金、元时期的考古发现

10世纪初到14世纪中叶，北方草原民族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兴起于中国北方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相继在北中国建立政权，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契丹统治者在得到燕云十六州之后，于公元947年改国号为大辽，以幽州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到辽圣宗开泰年间，辽在南京置析津府，治所也在南京。金帝完颜亮南迁，在原辽南京的基础上建立金中都，北京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元朝建立后，又在原金中都的北部建大都，北京地区由汉唐时期的边疆重镇，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的城市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辽金元城址考古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对辽南京城的考古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根据文献资料及考古调查及发掘资料研究，辽南京城是在唐幽州城旧址上加以修建而成的，大致位于今北京市西南部的宣武和丰台区，由大城和皇城组成。辽南京皇城位于城西南隅，幅员五里，四面均有门。

对于金中都的考古调查及清理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修建广安门火车站时曾发现几百座辽墓，以护城河与之相隔的陶然亭正北也发现了金代建筑遗址，出土沟纹砖以及石球等，根据墓葬一般在城外，石炮弹一般储存在城边作防守的规律，基本确定金中都的东城墙在直贯陶然亭南北一线不远，发现的建筑遗址可能就是东墙遗迹。金中都的北垣与辽南京北垣重合，东北转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今白云观西1公里有会城门，是北垣西边的门。西垣的北端在会城门东不到0.5公里的地方，南端在今万泉寺西南的凤凰嘴村，南北端之间有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夯土层厚5~10厘米。1992~1994年的北京西厢工程发现地下遗迹700余米。南垣的西南转角在今凤凰嘴村，东南转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东南的四路通，两端之间一段由西向东的凉水河，曾作为金中都的南护城河，其岸可见断续土丘状城墙。1991年发现的金代水关遗址，基本确定了南垣出水口的具体位置。这些考古发现资料，基本都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在金中都的东北方修建大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筑城工程全部完工。元大都城的修建利用了金代离宫的旧有基础，都城的布局安排，大体沿袭了金中都的做法，外郭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套合组成，规模宏大，形制整齐，既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世界的国际大都会。元大都后直接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直至今天北京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保留着元大都布局的旧迹。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元大都的考古调查、勘探以及发掘资料，元大都外郭城平面为长方形，经实际勘

测，北城垣长6730米、东城垣长7590米、西城垣长7600米、南城垣长6680米，周长共约28600米，这与史料中记载的“城方六十里”、“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大体相吻合。元大都北面的城墙和东西两面城墙的北段，至今地面上仍旧保存有遗迹，即今北京北二环外的所谓“土城”。元大都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与明清北京城的東西城墙一致；南城牆的位置在今东西城长安街的南侧。1969年发现的和义门瓮城城門遗址中保留较为完整的铁“鹅台”（即承门轴的半圆形铁球）和《营造法式》的记载完全一样，为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例。这座城門在明代继续使用了60多年，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曾重修一次，到明英宗正統元年（1381年）重建北京各城門、瓮城时，才被废弃而包入西直門箭樓下的城牆内。

近年来对元大都的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有两项。2002年在元大都北土城花园路段的西部清理了一处水关遗址，南北向穿通土城，用砖石垒砌而成。2007年玉河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处元代的堤岸遗址，下层为石结构，上层为夯筑而成。这些都为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元大都排水系统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2. 金代皇陵的考古发现

金代皇陵是近年来北京金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金陵位于房山周口店镇西北10余里的龙门口村北大房山下。这是有史以来在北京地区营建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帝王陵墓群。金陵的营建比明陵约早260余年，明天启二年（1662年），统治者惑于形家之说，对金陵进行了毁灭性破坏。清朝入关后，虽曾派人对金陵进行了部分修建，但历经300余年的风雨，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为的破坏，陵区内的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致使人们对金陵陵区内建筑和墓葬情况很少了解。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金陵的主陵区内不断发现金代墓葬，并有零散文物出土。如1971年初，在周口店坟山村，曾出土6具石棺，并在石棺随葬品中发现鎏金金面具1件；1972年12月，长沟峪煤矿在陵区兆域内的猫耳山断头峪基建施工中发现一组石槨墓，由5具石槨组成“十”字形，主墓正中，石槨东西向，槨内有一具柏木红漆残棺，外壁用银钉嵌鑲精美华丽的火焰云龙纹，棺内瘞葬11件精致的雕花玉佩和花鸟饰件；1978年冬，在金陵主陵区内的陪葬墓中，出土宋代三彩琉璃枕1件；198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再次对金陵进行了历时3年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的汉白玉、青石花岗岩等建筑构件。2001年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陵主陵区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并在2002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主陵区进行考古勘察和试掘，通过1年多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了解了主陵区地上地下遗存的具体位置、形制和结构等，为研究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金代陵寝制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根据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可知，金陵主陵区的平面布局以神道为中心轴，两侧对称分布，由石桥、神道、石踏道、东西台址、东西大殿、陵墙及地下陵寝等组成。此次对金陵的清理和试掘，还基本确定了《金史》中记载的十帝陵的位置，最重要的收获是清理了金太祖睿陵地宫。金太祖睿陵地宫为石圻竖穴，平面长方形，内共瘞葬4具石槨，M6-1、2为两具青石素面槨，南北向放置于地宫西侧。M6-3、4为汉白玉玉雕凤纹、龙纹石槨，东西向放置于地宫中部偏北。龙槨明天启年间被火药炸毁，出土头骨一具。凤槨保存

完好，为太祖的钦宪皇后，出土有金丝凤冠和白玉耳坠等物品。

3. 佛教遗迹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早在辽南京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城内外庙宇相望，古塔林立。到了金中都时期，城内更是“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大量的辽金元时期的佛教寺庙早已不存，有的甚至不见于文献记载，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这一时期的佛教遗迹的发现，就成了辽金元时期考古发现的一大收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昌平银山宝塔群所做的考古调查，确认了该宝塔群中7座宝塔的建筑年代，为金代5座，元代2座。这是当年北京地区的一座以墓塔为主体的寺院，当时认为可能是金中都延圣寺的下院和塔院。后据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清理，证明银山塔林的塔与寺庙不是同时期的建筑，后者年代大约在元末或明初。

在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辽金元佛教遗迹中，塔基的发现是最多的一项。已发掘的辽代塔基最主要的有房山区云居寺南塔塔基、密云县冶仙塔塔基、顺义县净光舍利塔塔基、通州辽代塔基地宫等共计7处。金代时期的塔基有丰台区瓦窑村塔基和房山县坨里乡上万村的“土寺”塔基。200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大兴康庄发掘的25座塔基，是国内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塔基，均为砖塔，塔上部已被破坏，塔基形状可分为方形、圆形、六边形等。塔基前有踏道，塔基四周有散水，塔座转角处用经过加工磨制成各种样式的砖砌成。其中一座大型塔基前不仅有踏道，而且有祭台和经幢座。出土瓷器主要有瓷香炉、白釉杯、黑釉茶盏、白瓷盘、白釉印花瓷碟、白釉印花瓷碗、白瓷杯、白釉长颈瓶等。另外还出土有汉白玉菩萨、铜菩萨、舍利盒、描金皮盒、石块等。

四、明清时期的考古发现

北京地区的明代考古起步于20世纪前半叶，一些学者对明北京城及宫苑进行了考古调查研究，中国营造学社对十三陵、长城也进行了考古调查研究。清代的考古则因为长期受考古学界厚古薄今观念的影响，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明代考古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而清代考古则直到新世纪以后，随着大量基建工程的开展，才渐渐走进人们视野，目前所涉及的主要有墓葬、园林水系、皇家建筑、宫苑署邸和寺庙宫观等方面。

1. 城垣遗址

20世纪60年代，为配合大规模城墙拆除工程，考古工作者对明北京城的内城垣进行了局部的发掘清理；1998年改建平安大道时在北海中学发现一段明皇城北墙基础；200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又对明皇城遗址公园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大致明确了皇城东墙的走向及建筑结构，并发现了东安门、望恩桥燕翅等多处重要遗迹。通过对内城城垣的解剖，基本弄清了明北京城内城以及皇城城垣的结构和砌筑方法。

200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明城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表明,明代北京外城城垣的体量比内城城垣小。外城垣的土墙芯均以黄土夯筑而成,每隔四、五层黄土夯层,则夹夯一层碎砖头瓦片与土的混合物,厚在10厘米左右。从土芯的断面看,没有明显的二次夯筑现象。外城垣的基础部分随地势的高低而深浅不同,有的地段深达2.5米,有的地段仅深1米左右。外城垣内、外壁包砖,全部是用白灰浆砌筑的大城砖,外包皮砖层厚近1米,内包皮砖层厚0.7米左右。城垣上顶部的构造与内城相同,是在厚20厘米左右的三合土夯层上铺一层大城砖。内、外包皮城砖的下部亦垫有2~3层衬基大条石。

2. 明代陵寝考古

明朝在北京建立的帝陵共有两处,分别为十三陵和景泰陵。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区以北10公里的天寿山,从明成祖朱棣至崇祯帝朱由检,除景泰帝别葬金山外,其余十三个皇帝均埋葬在这里,合称十三陵。另外十三陵还葬有从成祖到崇祯帝的十三位皇帝以及他们的皇后,少数享有特殊礼遇的嫔妃也从葬于此。景泰陵则除葬有在“夺门之变”中被废的景泰帝外,还葬有早夭的诸王、公主以及不从葬的嫔妃。1956年,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位于十三陵中部偏西的大峪山下明神宗朱翊钧与其孝端皇后王氏及孝靖皇后王氏的合葬陵墓定陵进行发掘,发掘历时两年多,共出土文物2648件。这些随葬物的出土,对研究明代帝陵的丧葬制度、礼仪制度以及各类工艺技术等都有很高的价值,定陵的发掘是北京地区明代考古的一块丰碑。

3. 明代太监墓

太监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明代太监数量众多,宫廷里以太监为主体的衙门就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另外还有一些非常设宦官机构,负责监军、采办、征税、开矿等任务。除宫廷使用宦官外,宗室和王公贵族也大量任用宦官。有明一代,阉党专权,明朝的灭亡就与宦官的专权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宦官大多在北京终老,因此北京地区的太监墓数量颇丰,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自1950年以来,北京地区不断发现有明代太监墓葬,新世纪以来,在海淀区、石景山区发现大量的明太监墓群。据不完全统计,总数达几百座。2002年北京工商大学出土明太监墓群,2006年奥运射击场发现明太监墓群,数量达169座。从发掘的太监墓的丧葬文化现象可折射出这个群体的一些生活特征。

4. 毛家湾瓷器坑

2005年7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发现于西城区毛家湾1号院内的明代瓷器坑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瓷器残片,仅收归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就近100万片。这批瓷器残片大部分属明代早、中期产品,也有少量唐、辽、金及元代瓷器。窑口较多,至少涉及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钧窑四大窑系,另有少量瓷器不能确定窑口,虽无完整器出土,但有大量可复原器,普遍带有使用痕迹。其中的绝大部分属于民窑产品,仅有极少量官窑瓷器。除瓷器残片外,坑内还出土个别骨牌、猪下颌骨、石雕等遗物。毛家湾出土瓷器数量特

别巨大,汇集了元、明时期各主要窑场的产品,为研究元、明瓷器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5. 清代皇家建筑遗址

2003~2007年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发掘清理的清代皇家建筑遗址较多,故宫内西河沿遗址,清理出建筑基址、水井、灶、灰坑和排水沟等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纪年器物,如瓷器残片、铜钱、琉璃瓦等。在恭王府,清理出银安殿庭院基址及东路乐道堂庭院南侧的垂花门基址,对研究清恭王府的建设布局、形制、规模有重要意义。在国子监,清理出国子监祭酒院落、西厢琉球学馆基址和国子监街路面及牌楼月台等遗迹。

6. 清代园寝考古调查

从2001年开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科研人员对清代园寝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于2008~2009年间,完成了近300个清代园寝的考古调查。清代园寝是包括清代历朝帝王的妃子、公主在内的宗室王公贵族等有爵人员的墓葬,是清王朝独特的一种丧葬文化现象,透过这种丧葬文化现象,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家族经济状况等。清园寝这一领域以前学术界涉及很少,且不全面、不成系统。清园寝大多分布在北京地区,也有一部分分布在周边省市。这些园寝目前多数已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被毁,通过考古调查来尽可能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就成为一项十分迫切而艰巨的重要工作。通过调查,研究人员发现有一些园寝尚存遗迹、遗物,这不仅对园寝研究工作,而且对文物保护工作都有重大意义。

7. 园林水系遗址的考古发掘

近年来在北京地区的考古中,对清代的园林水系遗址的考古调查的发掘工作,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从新世纪初到200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共勘探和发掘清代园林水系遗址12处,其中7处遗址位于圆明园遗址内,另外5处遗址分别是畅春园大宫门建筑遗址、西花园石桥遗址、金台夕照遗址、香山静宜园来清轩遗址和玉河遗址。这些遗址不仅有宫殿、斋、堂、亭、轩、楼、馆、榭、寺庙等建筑基址,还有广场、假山、水池、水闸、桥、道路等遗迹。圆明园内的7处遗址分别是含经堂遗址、长春园宫门遗址、藻园遗址、北夹墙遗址、水闸遗址、正觉寺天王殿遗址和正觉寺门前道路遗址等。2007年4月~2008年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万宁桥至北河沿大街段的玉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玉河遗址的发掘,对探讨古玉河的走向、建造年代及河道变迁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并为古代北京漕运和水源、供排水系统、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京的考古事业蓬勃向上,飞速发展,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北京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有的考古发现被列为全国重要考古发现,有的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60年来,北京文物研究所对出土文物进行了科学保护,在土遗址、纺织品、漆木器、金属器物的保护方面做了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墓葬壁画的科学保护上有突出的成绩。60年来,北京文物研究所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著作,特别是近几年,每年以十

余部的数量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和学术专著，在考古学界赢得了好评。60年的风雨，60年的收获，60年的华诞，60年的成就。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和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用辛勤的汗水和劳动，把沧桑的遗址变为世人瞩目的文化遗产，其辛之艰，其劳之大，其功之伟，历史将永远铭刻。

主编宋大川策划了本书的选题，审阅了本书全稿；副主编夏连保两次审阅书稿，指导作者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副主编张治强负责组织、联系和出版工作；郭京宁撰写了史前时代的考古；张智勇撰写了夏商周时代的考古；胡传耸撰写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古，张治强撰写了两汉时代的考古；董坤玉撰写了魏晋隋唐时代的考古；于璞撰写了辽代考古；丁利娜撰写了金代考古；孙劭撰写了元代考古；李永强撰写了明代考古；朱志刚、张中华撰写了清代考古。

宋大川

前 言	宋大川
第一章 北京史前考古	1
第一节 北京史前考古概述	1
第二节 旧石器时代	4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	18
第二章 北京夏商周考古	55
第一节 北京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	55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	61
第三节 夏商周时期的重要墓葬	76
第三章 北京春秋战国考古	97
第一节 北京春秋战国考古发现与研究	98
第二节 北京春秋战国燕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	100
第三节 玉皇庙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	122
第四章 北京汉代考古	133
第一节 概 述	133
第二节 北京汉代考古发现	135
第三节 北京汉代考古的研究现状及认识	138
第四节 北京汉代重要城址	148
第五节 北京汉代重要墓葬和遗址	150
第五章 北京魏晋南北朝考古	187
第一节 北京魏晋南北朝考古发现与研究	187
第二节 蓟城遗址	189
第三节 重要墓葬	190
第四节 宗教遗迹	199
第六章 北京隋唐五代考古	201
第一节 北京隋唐五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
第二节 唐幽州城与县属乡村	205

第三节	重要墓葬·····	213
第四节	其他重要考古发现·····	230
第七章	北京辽代考古·····	243
第一节	北京辽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243
第二节	城址与塔基·····	251
第三节	重要墓葬·····	262
第四节	重要窑址与窖藏·····	287
第八章	北京金代考古·····	293
第一节	北京金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293
第二节	金中都与金皇陵·····	302
第三节	其他重要墓葬·····	324
第四节	其他重要考古发现·····	341
第九章	北京元代考古·····	353
第一节	北京元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353
第二节	元大都城址·····	355
第三节	元代墓葬·····	369
第四节	其他考古发现·····	378
第十章	北京明代考古·····	387
第一节	北京明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387
第二节	长城与北京城垣·····	391
第三节	陵寝与重要墓葬·····	398
第四节	其他重要考古发现·····	422
第十一章	北京清代考古·····	429
第一节	北京清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429
第二节	园林水系·····	435
第三节	宫苑署邸·····	455
第四节	寺庙宫观·····	464
第五节	重要墓葬·····	475



第一章

北京史前考古

第一节 北京史前考古概述

史前时代指人类使用文字之前的历史时期，包括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史前时代，占据了北京历史99.3%的时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1918年安特生对周口店的试掘，揭开了北京地区史前考古的序幕。此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工作者们筚路蓝缕的工作，迄今发现了史前时期各阶段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80余处，古生物化石地点30余处。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把北京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距今60万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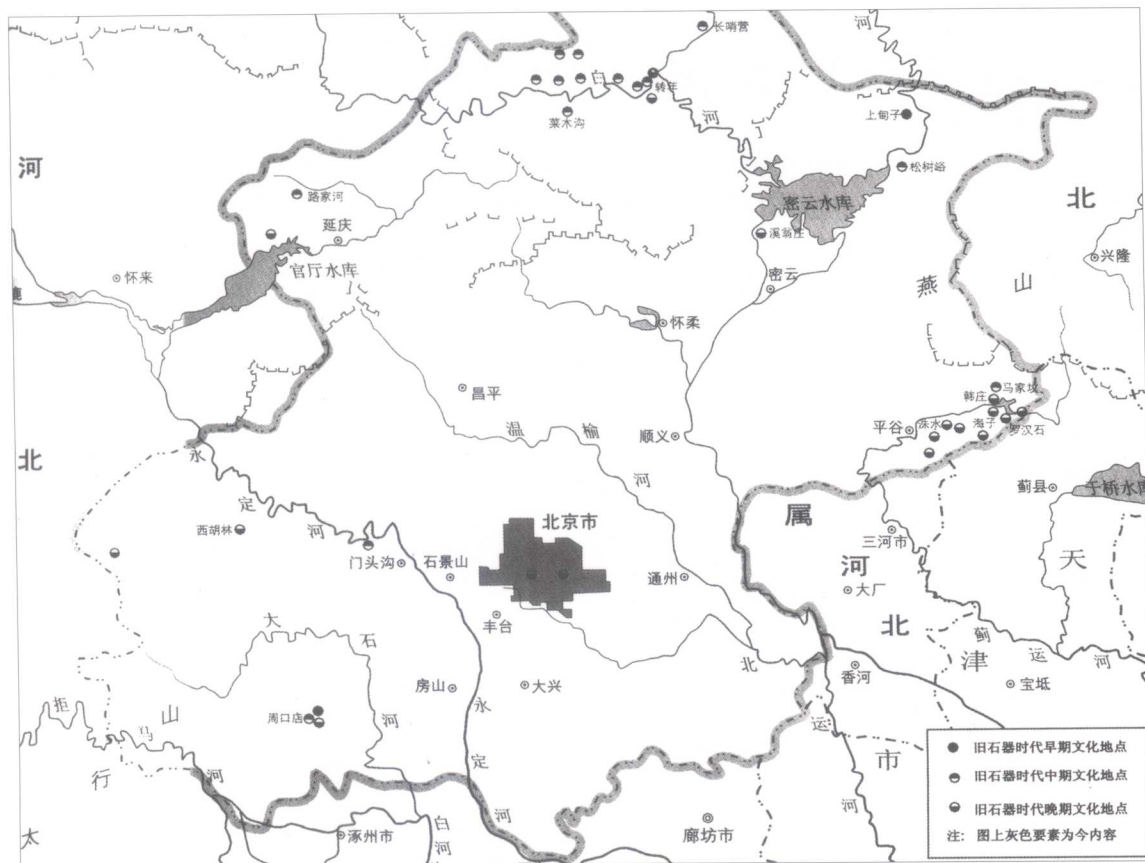


图1-1 北京旧石器地点分布图